

# “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

——重温邓小平60年前的一次重要讲话

□ 倪德刚

地位与角色决定人的视野，使命与担当决定人的思想。1952年，邓小平由西南局第一书记到中央任政务院（国务院）副总理。由此，他的工作视野、他的理论思考与地方工作时，大不一样。《邓小平文集》中卷，有三篇文章，即《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军队到地方到群众那里去取经》《军队的立脚点要放在准备打仗上》，实际上是邓小平1958年7月19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的一次讲话。

**“思想解放，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解放，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决定的意义。后来者可以居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

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最强音，是战胜一切困难、取得一切伟大成就的最有力的武器。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指出，思想不够解放，落后于群众，远离实际、远离群众的结果，就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当时，邓小平紧紧抓住思想解放的“关键少数”，指出：“思想解放，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解放，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决定意义。”邓小平为什么强调，高级干部的思想解放具有决定意义呢？其一，他说：事实证明，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人，由于思想解放，方法问题解决了，效果就完全不同。这是思想、方向、方法对了的结果。思想、方向、方法是互相关联的，是一个整体。他举例说，毛主席拿出来的东西，就包括着思想、方向、方法。思想对头了，方向、方法就对头了。其二，他强调：所谓思想对头，就是打破迷信，从中国自己的实际出发，去想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不从实际出发，所以非犯错误不可。其三，他指出：思想一解放，共产主义风格又发扬起来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共产主义风格。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毛主席思

## 核心阅读

60年前，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思想解放，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解放，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决定的意义。后来者可以居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要用和平的形式，用发展速度来比垮帝国主义。

想，力量大极了。

思想解放的关键是要解决实践新难题、现实新问题，解决问题就需要有新语言、新思想。邓小平指出：思想解放，破除迷信，后来者可以居上。毛主席说，马克思是不是可望不可及呢？也不要那么迷信。邓小平强调：“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

**“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要在自己的纸上写出自己的好文章，完全可以设想，在某些方面会比苏联写得更好，写得更美、更漂亮。”**

60年前，邓小平就大力提倡敢想、敢说、敢干。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要干革命，白好写更好的文章、好画最美的图画，这是个好条件。我们要用好这个条件，不能硬搬外国的。学习苏联是不错的，应该学。但是，停滞不前，思想就会僵化。我们不能都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如果外国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画；外国没有的字，我们就不能写，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超越别人，就不能对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要相信我们有很多好的条件，可以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也可以做得比别人要好。

那么，怎样才能超越别人，对世界作出贡献呢？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

一是我们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原则、普遍规律。但是光这样不行，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

和我们自己的特点、实际结合起来。普遍规律是大同，否认大同就是修正主义；否认自己的特点和实际，就是否认小异，就是教条主义。犯修正主义错误，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犯教条主义错误，我们的事情同样会遭受失败。

二是只有认清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实际，才能把革命搞好，才能把建设搞好。中国革命就是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毛主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领导我们搞革命，是在中国的纸上写的一篇中国文章。

三是我们要以自己为主，要在自己纸上写出中国自己的好文章，在某些方面会比苏联写得更好，写得更美、更漂亮。搞建设应当同搞革命一样，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当然也包括别国的经验，首先是苏联经验。他们的经验是三部分：一部分是完全可以用的，叫普遍真理；一部分是只能作参考的，就是它本国适用，不完全适用于我国；还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如斯大林忽视农业，不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吗？因此，要善于吸取他们的经验。但是，我们要以自己为主，要在自己纸上写出中国自己的好文章。有这种精神，可以比别人写得好。因此，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有自卑感。在世界上，我们有自己的贡献；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贡献。

**“要用和平的形式，用发展速度来比垮帝国主义，战争可能打不起来，而且越往后越难打。世界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很多，我们中国人就天不怕地不怕。”**

邓小平是世界公认的战略家，这

次讲话，他作出了改写历史的两大战略判断。

其一，要用和平的形式，用发展速度来比垮帝国主义。1950年代后期是美苏冷战对峙，全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邓小平纵观天下大势，明确提出“用和平形式”“用发展速度”，“用比垮”而不是“打垮”战胜帝国主义，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论断。这个论断的核心是“用发展速度比垮帝国主义”，当时的“帝国主义”何其强大，诸如美、英、法等等，怎样超过他们，如何比垮他们，在邓小平看来，只能用“发展速度”。半个世纪后，当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时，我们不得不敬佩邓小平当年的高瞻远瞩。

其二，战争可能打不起来，而且越往后越难打。1950年代世界大战风云密布，邓小平作出了英明的战略判断，他分析说：一是帝国主义现在是矛盾重重，内部不统一，气不足。二是你怕，他也要打，他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的国防力量，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都要加强。加强国防，无非是三个内容：一个是常规装备、常规军队；另一个是人民；再一个是尖端技术，就是原子弹和导弹。三是归根结底，还是人民最厉害，还是靠人来打胜仗。因此，我们的军队还是要讲思想、讲政治。今后，有了原子弹还是要这样。总之，不发生战争，我们好好建设；发生战争，我们就打完了再建设。四是我们中国人睡得着觉，是乐观主义者。世界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很多，我们中国人就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搞好。国家有了经济基础，军队这一套搞起来就快。我们几年来就是搞这个事情。把我们国家建设好一些，把我们军队建设好一些，加上物质准备、精神准备，思想上不要放松，这样遇到任何情况，我们都应付自如。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重温60年前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很有启发意义。

## 理论阐释



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做到“顶天立地”“眼高手低”。

“顶天立地”是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境界上来讲的，这里涉及的是研究者的精神层次。马克思主义研究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知识性的探索与发现，更应该是一种切乎自身实践品行的“明道”与“信道”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在于研究者本人在研究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同和忠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形成过程就是研究者本人认同与信仰的自然流露过程，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传播过程就是增进和扩展马克思主义认同度与信仰度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顶天立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境界的全面提升。

所谓“顶天”，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学习好、理解透、运用好，将之有效融入到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探讨之中。所谓“立地”，就是要紧密结合时代境遇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导向意识，在对社会现存的批判性反思中增强直面社会现实的能力，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在切入真实生活世界中焕发生机与活力，确保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得到彰显。当然，“顶天”与“立地”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缺少“立地”的“顶天”是充满空想色彩的乌托邦规划，每一步的推演都显示出教条主义的幼稚与盲目；失去“顶天”的“立地”是踽踽徘徊在原地的盲人摸象，每一次的尝试都少了经验主义的短视与狭隘。惟有“顶天立地”的浑然一体，才能真正彰显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变革社会的巨大创造力量。

“眼高手低”是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上来讲的，这里涉及的是研究者的阐释性把握能力。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本身就是对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种实践性阐释过程，研究立意是否高远，研究视角是否新颖，研究过程是否逻辑，研究结论是否科学……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研究者的视界和学养。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关乎当下的社会现实，真实再现人类历史在具体时代境遇中的发展演变；马克思主义研究更要前瞻未来，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对时代发展作出科学判断，在事实描述与价值规范的充盈张力中创造未来，在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中引领发展，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

#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顶天立地』与『眼高手低』

□ 韩升

契合中开启人类的新征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眼高手低”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行之有效。

所谓“眼高”，就是要确保马克思主义研究拥有高远而宏大的视野，要立足全世界、胸怀全人类，彻底抛弃狭隘封闭的孤立主义研究态度，在开放与包容中拓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勇于破除壁垒，大胆接纳一切人类文明进步的优秀成果，在批判性继承中传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透析历史、批判现实、展望未来的伟大理论品格。所谓“手低”，是指我们切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要真实“为我”，要在避免陷入人云亦云的盲目跟风中确立冷静审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还要在批判大而无穷的宏大叙事中真正形成马克思主义贴近生活的话语表达方式，更要凭借“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心和毅力去深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中探求变革社会的理论真谛。毋庸置疑，宏大高远的学术视野引领着扎实深入的文本研究和客观谨慎的现实反思，由此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站得稳、立得住、看得远、走得实。

## 专家视点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西方国家经济复苏乏力，人们开始对西方的那套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产生怀疑，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呼唤着中国声音，关注着中国作为，期待着中国答案，热议着中国方案。作为负责任大国，回答当今时代、当今世界面临的新课题是中国的责任，更是向世界说明和展示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国际社会对中国还存在不少误解，“中国对手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更要集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

## 国际传播中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讲好中国故事这一课题已经提出多年，但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进一步破题。讲什么、不讲什么、怎么讲，包含着政治判断和价值选择，也充满着方法论和艺术。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真正、完全、彻底地摆脱“做了事情不容易总结出道理，有了道理不容易提炼出理念，有了理念不容易

# 用全新理念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 刘明

讲出国门，讲出了国门不容易让更多人听到，有人听了也不容易让他们完全相信，或者说听者有时是半信半疑、将信将疑”的被动局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讲好中国故事，不但要讲得正确，讲得清楚，还要讲得有效，讲得艺术，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花大力气，下深功夫。作为出发点，则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进行全面、深度的再思考。

## 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阐释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国理念

长期以来，中国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此相应，在新实践、新作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但是，如何更好地进一步提炼，如何向世界进行更好地传播，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也就是说，在新时代，我们要善于对鲜活的、带有泥土味的、冒着热气的生动实践进行理论抽象和思想总结，也要善于对这些新理论、新思想进行有效提炼、系统归纳、艺术表达、深入阐释，善于由浅入深、由表

及里，最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互动与往复。

就国际传播而言，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要进一步注重阐述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国理念；在讲述世界故事的同时，要进一步注重体现世界故事背后的中国“世界观”。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人们明显地感受到：海外受众的兴趣点、“口味”、关注模式等等，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对于海外受众而言，“简单地”讲故事，或者为讲故事而讲故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了。对于负责的国际传播学者和实践者来说，“简单地”甚至“迎合式”地讲故事，更不用说一定历史阶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少数“猎奇性的”所谓“中国故事”，即使它们在短期内能获得“亮眼”的点击率、粉丝量，它们也偏离了我们讲故事的初衷，因而从根本上说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在和海外受众深入的互动、交流中，一个带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象是，听完“中国故事”并不是结束，相反，它仅仅是开始。海外受众“听完故事”之后很自然地就会追问：为什么是这样？中国故事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逻辑和规律？这种内在逻辑和规律性能否引申出某种可以复制的经验 and 模式？更重要的是，各国受众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频繁地发

问，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对他们自己、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上的主张是什么？

因此，为讲故事而讲故事，其结果是并不能讲好故事。要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把中国故事背后的东西提炼、抽象出来，讲清楚，尤其要注重讲好见解、讲好方案、讲好理念，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世界观”。这无疑更高层次、更广义上的讲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他提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这既是长期和艰巨的任务，也是光荣的和历史性的使命。

可以预见，在新时代，我们将更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要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讲故事”，或者说，要更加深入地去研究、思考“讲故事”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内涵，进一步将“讲

好中国故事”引入更高层次的境界和更加广阔的活动舞台。

## 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新时代，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创新传播方法和手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急剧演变，我们感到，传统的业务内容、工作流程、推广方式、发展格局、人员结构等，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国际传播的需要，更难以实现加速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目标。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有的老内容、老流程、老方式、老格局、老结构，甚至在一定历史时期曾经不同程度上原有的方法和手段，今天不仅可能失去有效的效果，甚至可能难以为继。牢记使命任务，坚持守正创新，对业务内容、工作流程、推广方式、发展格局、人员结构等，进行全方位、全领域的再思考、再构造，正是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最鲜明的战略取向、最有效的方式

方法和最反映现代传播规律性的手段，甚至是艺术，也是真正实现推动国际传播工作不断强起来目标的根本路径。

在这一全方位、全领域的再思考、再构造过程中，必须进一步突出着眼深入人心，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自说自话没有出路，跟着西方话语体系亦步亦趋更没有出路，它需要我们不断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并让其在国际主流社会落地生根、深入人心。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既要胸怀全球，注重世界眼光、国际水准，又要站稳中国立场、把握中国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唯有如此，才能在国际传播中达到想要的传播效果，实现自己的传播目的。

还必须进一步强调注重议题设置，突出中国实践、中国理念对世界的意义。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迎来了世界或热切赞许、或挑剔质疑的目光。这些各种各样甚至性质完全不同的“国际反应”其实都很正常。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国际传播经历了更多具有“回应”性质的阶段，或者叫“中国国际传播1.0版本”，也经历了更多具有“营造”性质的阶段，或者叫“中国国际传播2.0版本”。当前，中国国际传播有了日益增多的“引领”性质，或者说，已经进入，至少是正在进入“中国国际传播3.0版本”。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要讲好中国故事，挖掘中国实践、中国理念对世界的意义，更加善于用中国理念引领世界发展的方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理念必须既具有中国和东方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和全球价值；既切合当代实际，又着眼长远未来。只有这样，中国理念才真正可能引领时代、塑造时代。